

# 农村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与现代化转型

卢青青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在阶层内婚制下,女性择偶对家庭因素的考量并未下降,而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基于关中农村经验,将女性择偶中的家庭考量放置在历史变迁视野中,可以看出,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经历了三个阶段变迁:从看重家庭社会地位,到看重家庭代内关系,再到看重家庭经济条件,这一演变分别对应大家庭、核心小家庭与代际资源剥削的选择逻辑。在此过程中,家庭不断地趋于核心化和私人化。这是现代性压力在农村女性婚姻选择中的投射,女性在择偶中从重视家庭的伦理性转变为重视家庭的功能性,家庭实现功能化转型。

**关键词** :农村女性;婚姻选择;家庭考量;现代性压力;家庭转型

**中图分类号** :C913.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20)02-0115-06

在乡村社会中,婚姻是青年走向成人的标志,也是其走向家庭和社区的标志。“成家即成人”,成家才能独立门户,完成家庭的继替。婚姻与家庭具有天然的联系,家庭的确立是以婚姻为基础的。因此,婚姻变迁往往是理解家庭变迁的一个窗口,尤其是婚姻选择的变化,不仅意味着婚姻逻辑的改变,也预示着家庭逻辑的变迁。

##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史无前例的发展浪潮中,社会的巨大变迁也改变了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农民的家庭与婚姻中。最典型的就是打工兴起之后人口流动与性别资源失衡下的农村男性婚配困难<sup>[1]</sup>及其对家庭养老秩序和代际关系的冲击<sup>[2]</sup>。这也是当前学界关注的重点。但是农村女性作为婚姻的另一方,其在婚姻选择中的家庭考量却容易被忽视,而这同样是家庭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面向。

当前学界对婚姻选择的研究,主要是从择偶标准与匹配效度的角度进行的。婚姻的择偶标准从传统时期更看重政治和家庭背景的“门当户对”,转变为更看重物质和个体心理需求<sup>[3]</sup>,比如年龄、身高和婚姻状况<sup>[4]</sup>等,尤其是伴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看重对方的经济社会地位<sup>[5]</sup>。这一变迁是伴随着打工经济兴起以及婚姻现代性自由观念的开放,婚姻模式从传统父母包办到现代个体自由恋爱的结果。

打工经济带来的人口社会流动重塑了婚姻的模式,同时也打破了传统的婚姻圈,形成婚姻市场。在婚姻市场中,

由于个体的差异无法实现完全自由竞争,而只能诉诸配对方式实现婚姻效用的最大化<sup>[6]</sup>。在此意义上,婚姻不仅是个体的自主选择,同样也是家庭和社区的策略。策略性的婚姻“旨在获取最大物质和象征利益的策略系统”<sup>[7]</sup>,这就是婚姻匹配问题。婚姻匹配不仅关系到婚姻的质量,也关系到婚姻的稳定性。性别资源的结构性失衡带来婚姻市场的竞争性。在竞争性的婚姻市场中,婚姻的策略选择有两种匹配方式:一种是同类配对,即在同一阶层内的婚姻配对方式。这种以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为主导的同类婚预示着社会开放性的不升反降<sup>[8]</sup>。另一种是梯度婚配,即遵循“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无论是城市女性还是农村女性,“男大女小”和“男高女低”一直是女性婚姻选择的主要形式<sup>[9]</sup>。

整体来看,相关研究注意到了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女性择偶的变迁意义。无论是同类婚还是异质婚,女性的婚姻选择愈发倾向“实惠化”。从学历和职业要求变成财产和事业要求,更看重男方的社会经济条件<sup>[10]</sup>。这是在男多女少的性别结构中,基于资源稀缺性而占居婚姻市场优势的女性,在婚姻策略中的理性选择。“择优而嫁”是女性摆脱贫困<sup>[11]</sup>和实现阶层跃升的手段,同时,较高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提高女性的婚姻满意度<sup>[12]</sup>。

但是当前的研究更多关注现代性婚姻的个性选择,家庭只是其中的一个微小变量,没有专门针对女性婚姻选择中的家庭变量进行细致考察。依据定量数据的结果,现代性的进入虽然带来以个体标准为基础的自致性因素的大幅上

**作者简介** :卢青青,女,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升,而以家庭背景为基础的先赋性因素却并没有如期下降,而是呈现倒U型<sup>[13]</sup>,先赋性因素的同类婚仍然是当前社会的主流<sup>[14]</sup>。可见,西方现代化理论所预期的随着工业化与自由情感的发展,婚姻选择会走向多元异质的趋势并没有在中国社会彻底呈现,女性的婚姻选择仍然延续传统的“阶层内婚制”<sup>[15]</sup>。在竞争性的婚姻市场中,婚姻选择不仅是个体的情感表达,也是家庭的谋划和博弈。婚姻选择中家庭因素的上升需要引起我们对家庭考量的关注。笔者将视角聚焦于农村女性的婚姻选择,着重分析其选择中家庭因素的演变,以历时性方式呈现女性择偶中家庭考量的历史演变,旨在探索这一演变的内在逻辑及其所带来的家庭变迁,以此理解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女性的婚行为和家庭转型。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法,结合笔者及所在团队于2018年5—6月在关中Q村为期20天的调研经验,根据对既有村组干部、社会精英、普通村民,尤其是对女性群体的个案访谈,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式访谈收集质性资料,进行深入分析。

Q村位于关中平原,全村715户,2738人,3700亩耕地,人均1.3亩。相对于平原区,当地是塬上地形,地形平坦但地势落差较大,水资源匮乏。近些年由于水库供水紧张,导致水费增加,当地的种植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本的一年两季——冬小麦夏玉米,转变为只种一季冬小麦。传统时期本地一直处于温饱有余的状态,因而农民都是守着土地过日子。对关中农民来说,建房和娶媳妇是其人生两件大事,靠着日常节俭,基本可以完成。直到近几年婚姻成本遽增,才打破了这一格局,当地农民也开始外出务工。但当地务工潮兴起较晚,2010年以后才真正形成,且是以附近省市为主的区域性务工,80%的家庭年收入在3万—5万元。因此,婚姻是当地农村家庭社会变迁的重要变量,从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出发,可以触摸当地家庭社会转型的脉搏。

## 二、农村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及其内在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从传统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其婚姻选择也在不断发生变迁。为便于分析,笔者根据Q村的婚姻变迁历程,按照不同年龄层次将农村女性择偶变迁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sup>①</sup>:一是当前六七十岁的老年妇女的择偶阶段,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集体时期;二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的择偶阶段,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即分田到户以后到打工潮完全兴起之前;三是嵌入市场经济体系中,以八〇后、九〇后为主的年轻女性的择偶阶段,主要集中在2010年以后打工经济彻底吸纳劳动力的时期。不同阶段女性在婚姻选择中关于家庭的考量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这一差异与家庭发展变迁的内在逻辑有关。

### (一)农村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

在婚姻选择的梯度偏好中,女性择偶一直存在对男方家庭的考量,不同时期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不同。笔者从大集体时期、分田到户以后以及城市化兴起以后三个阶段进行

阐释。

### 1.大集体时期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家庭社会地位

大集体时期,女性在妇女解放的政治话语及其参与劳作的过程中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和文化地位<sup>[16]</sup>。但是未婚女性作为半劳动力仍然嵌入父代家庭,没有实质的婚姻支配权。这与传统“尊尊亲亲”的文化惯习以及以家、户为单位的分配制对父权的延续具有内在关联,同时两性羞耻的文化观念也抑制了女性在婚姻选择中的自主性。因此这一时期的婚姻基本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个体是隐匿的,女儿完全听从父母的安排。男女双方通常还未见面就已确定了亲事,等到结婚才真正慢慢熟识起来,“即使见了面也不会表态,父母决定好了自己也就认定了”。

大集体时期村庄的传统伦理规约性很强,讲求的是大家庭家风与传承。因此,这一时期父母为女儿选择婚姻时更看重男方家庭的社会声望和地位,尤其是男方父母及其所处的家族在村庄中的社会性评价。一方面,在婚姻选择中更看重男方父母的社会声望,而非子代个体能力。“看父母不看子女,父母如果是明事理的人,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这一时期父母在村庄中的面子权威,决定其子代婚姻的选择梯度,女性择偶首先看其父母为人。另一方面,看重男方家庭的社会地位。家庭的社会地位不仅与父母为人及其所积累的社会性面子权威有关,同时也与其家族结构和地位有关。村庄共同体是由血缘和地缘关系建构的,血缘与地缘关系秩序形塑村庄的社会秩序,相对而言,越是血缘结构发达的地方,村庄的规范能力越强,对村庄秩序的影响也就越大。北方村庄多是功能性群体的聚合,村庄呈现为分裂型结构<sup>[17]</sup>,因而血缘结构往往决定村庄的内生社会秩序。关中地区血缘和地缘传统很强,血缘关系往往预示着家庭的社会地位,即家族大、兄弟多且关系和睦的大家庭往往意味着其在村庄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女性在择偶中更青睐此种家庭,以谋求在夫家村庄更好的社会生活。

因此,这一时期,在集体主义观念和集体制度的统摄下,村庄社会结构完整,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得以延续,以为人处事和血缘结构力量为标志的社会声望和内生权威构成了村庄社会地位的评价标准,也由此成为女性择偶的重要家庭考量。

### 2.分田到户以后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家庭代内关系

自1982年分田到户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家庭经济自主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进一步打破了村庄社会的封闭性,个体自主意识逐步加强。因此八九十年代女性的婚姻虽然仍是由父母主导,但是女性个体开始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这一时期的相亲男女双方可以见面,父母也会询问子女意见。

土地的家庭自主经营实现了家庭的经济独立,由此也弱化了血缘关系的先赋性作用,村庄社会关系的重心逐步从农户之间的关系转移到家庭内部的关系,家庭内部关系样态成

为村庄社会评价的重要参照标准。因此,这一时期女性择偶虽仍看重男方家庭的社会地位,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对家庭代内关系的重视。家庭的代内关系主要包括家庭内部的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婆媳关系以及妯娌关系等,这是家庭是否和谐的重要关系变量。这一变化与当时的同居共财模式有关,在此模式下的高密度交往容易发生摩擦,故而当时女性择偶都要求男方家庭必须是独家独院,多子共居模式的家庭一般很难找到对象。

案例1<sup>②</sup>:Q村5组的HGL,1973年生人,有三兄弟。大哥二哥结婚后一直没有分家,都住在一个大院内,大哥一家直到2000年才搬出去,二哥一家则是在2005年以后搬出去的。这种大家庭的居住模式导致幼子HGL在本地寻了5个姑娘都没成,“都是嫌我弟兄多而且住一个院,当时带个娃二婚的都不愿嫁”。一直到2002年,HGL29岁才结的婚,并且娶的是200公里以外甘肃凤县的媳妇。

这一时期,打工潮并未完全兴起,农民家庭以务农为主、务工为辅,因而社会分工不大,女性择偶对独家独院的要求,并非指涉家庭经济——“不是说老人要盖三栋房,而是只要你搬出去,哪怕没房,有一个单独的院子就行”。这样的选择,更多的是对家庭内部关系矛盾的规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000年初期,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家庭矛盾频发,这一时期家庭代内关系紧张,是青年妇女自杀的高峰期<sup>[18]</sup>,女性择偶标准因此更为看重家庭内部关系。

### 3. 城市化背景下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家庭经济条件

伴随外出打工的兴起和深入,劳动力逐步实现并彻底市场化,劳动力的外流,一方面使得个体从父代家庭的经济依附中独立出来,子代愈发独立,尤其是女性独立性的增强,社会地位逐步增高;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外流也打破了传统婚姻圈,与女性区域务工相适配的区域性婚姻市场逐渐形成,在重男轻女的性别比失衡下,女性开始占居婚姻市场的优势地位,婚姻选择的自主权进一步增大。因此,这一时期,在经济独立与婚姻自由话语支配下,女性择偶愈发由个体主导,父代愈发处于子代婚姻决策的边缘位置。

婚姻的自主性带来婚姻的私人化,因而婚姻愈发变成男女双方的互动选择,个体的外形、工作与交往能力等愈发成为重要的择偶标准。但与此同时,家庭考量在择偶中的比重并未降低,相反,女性择偶愈发重视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其中,男方家庭的经济水平、男方父母的劳动能力及其是否有资本买房买车等成为新的婚姻选择尺度。“原来只要日子过得红火就行了,比如他父亲是个匠人,收入不错,家里房子盖好,装修好了,一家人都还不错就对了,现在要买房买车才行,托人说媒都是先看条件后见面。”

这一方面与市场经济和现代性观念的侵入对村庄内生社会结构及其价值规范的冲击有关。现代性的进入,打破了村庄传统内生社会秩序,市场经济价值成为取代原有的伦理价值评价标准,成为村庄的主导价值,家庭经济水平和经济

能力已经成为村庄社会地位的主要衡量标准,家庭的经济标准因此成为女性择偶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与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有关,婚姻市场中的女性优势赋予女性充裕的婚姻选择机会与空间,由此形成女性的婚姻市场要价<sup>[19]</sup>,婚姻的市场化与物化使得家庭经济条件愈发成为男性择偶的刚性约束条件,越是家庭条件好的男性婚配的优势越大,女性在择偶中也更为注重家庭经济标准。

如此,这一时期,女性择偶不仅从家庭兼顾个体,对个体的择偶能力要求较高,尤其是男性能否获得女性的青睐取决于其交往、表达等恋爱能力,而且从家庭关系偏重家庭经济,对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要求较高,婚姻选择日趋功利化。

### (二) 农村女性择偶的内在逻辑

不同时期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不同,其演变逻辑也不同。具体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处于大集体时期,女性婚姻由父代主导,遵循的是大家庭的选择逻辑,更为看重大家庭在村庄中的整体性力量与社会性评价;八九十年代女性婚姻虽然仍是父代主导,但是在其择偶的家庭考量中更看重家庭的代内关系,这是小家庭崛起的必然结果。2010年以后,婚姻的自主权掌握在子代手中,但是女性择偶仍然对家庭具有很强的考量,注重男方的家庭经济条件,这本质上是城市化压力下对代际资源吸纳的策略选择。

#### 1. 依附性地位下的大家庭选择

在大集体统辖下,个体被统合进大家庭的父权和大集体的公共事务中。这一时期以户主为单位的工分制强化了父代权威,女性虽然具有劳动能力,但是其劳动成果掌握在父代手中,婚姻由父代主导,婚后也从属于夫家。女性婚姻缔结旨在实现“两姓之好”,女性婚姻由此成为双方家庭的重要关系桥梁,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自然成为女性婚配的最佳选择,这也是两个家庭乃至两个家族结合的理性策略。因此,这一时期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是其在依附性地位下基于村庄社会地位标准的大家庭选择逻辑。

选择大家庭并非出自封建家族等级观念,而是出于家庭发展壮大需求。家族是以血缘关系凝聚起来的认同单位,这一认同在社会互助层面具有较强的行动力,实现对自己人的保护性结构。关中农村虽然没有形成像华南地区的强宗大族,但是其以户族为认同与行动单位的血缘结构,在红白事和族内纠纷调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up>[20]</sup>。六七十年代物质匮乏时期,结婚、建房、丧葬等人生大事都需要宗亲协助,和睦的大家庭则可集中力量办大事,推动小家庭完成家庭的基本再生产。大家庭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越高,其所具有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就越大,在以集体主义和伦理规范为标准的村庄社会评价体系中,家族门风与声望成为大家庭和睦乃至集体行动的驱动力,因而女性择偶对大家庭社会地位的看重,实质上是对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大家庭所蕴含的集体能量与支持结构的看重,这既是为满足个体在村庄中获得更高社会性面子的价值性需求,也是出于个体家庭基本再生产的功



能性需求。

2.核心小家庭的崛起

分田到户后土地分散经营实现了家庭的自收自支,而非大集体时期的大锅饭,这无疑调动了劳动力的积极性,但是土地是按照村庄成员权而非父权分配的,且家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个体的勤扒苦做,而非大家庭的支持,这就显然弱化了父代权威,同时激起了子代单干的欲望。这一欲望在大集体时期已经萌芽。集体时期大锅饭下年长能干的子代对大家庭的付出显然更大,但家庭资源是统筹于大家庭发展的,这就激起子代的不满。分田到户以后,依托于土地的精耕细作可以维持独立生存的子代对大家庭的依附性降低,大集体时期的弱激励机制就难以为继,子代以分家形式另起炉灶,小家庭日益崛起。分家的子代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无法实现完全独立,因而分灶分财但并未实现彻底分院,同居分室的高密度居住空间及其密切互动,在小家庭发展逻辑主导下对大家庭资源具有内在的竞争性,多子家庭的竞争由此引发家庭矛盾冲突,而已然衰落的父权无法实现有效平衡,矛盾不断外溢。

因此,这一时期女性择偶极为看重家庭内部关系,会提出独家独院的结婚要求。这一要求表面上看是对大家庭内部关系的要求,但事实上其并未对大家庭内部和谐抱有深切期待或刚性约束,相反这一要求实质上是子代核心小家庭意识崛起,从而试图摆脱大家庭束缚的内在规定,这意味着家庭关系从公共性层面转向私人性层面。

3.城市化压力的代际转移

市场经济不仅打破了村庄社会边界,导致内生社会规范衰落,同时也不断吸纳人财物外流,导致村庄的留守性和空心化。八〇后、九〇后的年轻一代很早开始嵌入市场,群体

村庄生活记忆淡薄,生产生活的市场化带来其社会意义的城市化,即年轻一辈对留守村庄预期不高,而大多在城市化吸纳下进入城市。由于进城成本很高,尤其是买房成本遽增,仅靠大中专毕业的年轻群体很难实现独立进城买房,因而不得不依赖家庭,这也是女性择偶对家庭经济条件看重的原因。

家庭之所以支持子代买房,归根结底在于买房与婚姻的捆绑,即进城买房成为子代成婚的刚性约束条件。北方农村代际责任相对比较厚重,其中为子代成婚不仅是父代重要的人生任务,也是其厚重代际责任的要求。关中农村作为传统的北方农村,父代的婚配责任较重,婚姻就不仅是子代个体的事情,也是父代的责任,这就强化了本地婚姻偏好,因而本地婚姻圈是区域性的婚姻市场。在“性别挤压”下,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激烈,倒逼父代家庭卷入子代婚姻压力中<sup>[21]</sup>。由此,女性以进城买房的婚姻要价形式提前从男方父代家庭透支一部分财产,以实现其小家庭的城市化发展目标。这本质上是利用当地厚重的代际婚配责任,通过提前分家从男方父代家庭优先集聚资源,支撑子代小家庭的顺利进城。在此意义上,这一时期女性择偶对男方家庭经济条件的要求,是试图将城市化压力通过代际责任转移到男方父代身上,父代厚重的婚配责任为这一压力转移提供了合法性。

综上所述,不同历史阶段女性择偶中的家庭考量不断发生变化,从看重家庭的社会地位,转向看重家庭的代内关系及至转变为青睐家庭的经济条件。女性择偶中的个体性因素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对家庭的考量也并未减弱,不仅如此,女性择偶中的家庭考量愈发工具化,也因此趋于功利化,其逻辑演变趋势中对家庭内部关系尤其是代际关系的要求和调动越来越高,家庭在此过程中悄然发展着变化。具体见下表(表1)。

表1 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与逻辑演变

择偶阶段	婚配主导权	择偶因素	家庭考量	家庭逻辑
大集体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父母	家庭	家庭社会地位	依附大家庭选择
分田到户以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	父母	家庭	家庭代内关系	核心小家庭崛起
城市化时期(2010年以后)	子代	个体+家庭	家庭经济条件	城市化压力转移

三、农村女性择偶中的家庭演变与现代化转型

女性的婚姻选择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对家庭考量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变迁,也意味着家庭结构与家庭性质的变迁,家庭在此变迁中不断实现现代化转型。

(一)农村女性择偶中的家庭性质变迁

家庭作为夫妻与子代组成的三角结构<sup>[22]</sup>,伴随着子女的成婚不断发生变动。子代婚姻推动着家庭结构的变动,并不断改变着家庭的社会性质。家庭经济与居住空间是家庭独立的经济基础,这一经济基础的变化同时厘定了家庭内部的权责关系边界,从而改变着家庭性质。从家庭经济、居住空

间和家庭责任三个维度呈现家庭性质的社会变迁,家庭出现核心化和私人化趋势。

首先,家庭经济从统筹到独立再到杂糅。集体时期大家庭的声望和社会地位是女性婚姻选择的首要考量,这也孕育着大家长的权威。因此,这一时期家庭经济由具有内生权威的父代统筹,运用到整个大家庭中,依附于大家庭的子代小家庭不是独立的户单位。分田到户以后,土地按人分配赋予子代小家庭以独立能力,小家庭由此成为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率先从经济上独立出来,女性择偶对独家独院的要求进一步推动了小家庭的独立。但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进城压力倒逼子代重新与父代资源进行统筹。这种统筹主要

用于子代核心小家庭:一是婚前子代务工收入与父代兼业收入统筹用于子代结婚;二是婚后父代务农收入用于家庭日常开支与照料孙辈,子代务工收入纳入小家庭发展,家庭的经济尤其是父辈资源被不断杂糅进子代家庭中。可见,从大集体到分田到户再到城市化兴起,家庭经济经历了从统筹到独立再到杂糅的过程,家庭的核心化趋势明显,家庭财富愈发集聚到小家庭中。

其次,居住空间从统合到分离再到聚合。在经济匮乏时期,经济的独立并没有实现居住空间的彻底独立。从父代大家庭分离出去子代仍然与父代及其他兄弟家庭形成共居模式,也因此激发了诸多的家庭内部矛盾,这就刺激了女性在婚姻选择中强调居住空间的独立。到90年代中后期,经济条件满足下子代小家庭的独家独院居住模式实现,子代家庭从居住空间上实现了独立,但是打工经济的兴起带来父子两代家庭在空间上的自然分割,留守在村的父代家庭需要帮助子代家庭照看家户或田地,因而代际之间又形成了新的共居形式,即父代长期住在子代家中或子代在买房预期下未在村中建房从而继续与父代合租,但是因为子代在村居住时间短,因此矛盾不大。这种居住空间的重新聚合并非大家庭氛围的感召,而是通过与父代合租,以期挤占更多的父代资源。可见,空间聚合显示了小家庭为已的私人化倾向。

再者,家庭责任从统摄到清晰再到模糊。集体时期,在大家庭同居共财的统筹模式下,家庭责任是统摄性的,成家子代不仅要负责养老,也承担着弟妹的婚配责任;同时父代权威的持存与村庄伦理规范的约制,使得当地的养老责任比较厚重,家庭责任主要是对上的。子代家庭经济的独立与分家,改变了原来统摄性的家庭责任,家庭责任划分极其清晰。按照诸子均分的原则,兄弟结婚的任务完全落到父母身上,养老责任及相关费用由子代均摊,子代主要投入个体小家庭的发展中。但是打工经济与城市化吸纳,尤其是经济的杂糅与空间的聚合导致当地的分家规则出现模糊化,原本清晰的家庭责任边界被打破。为谋求核心小家庭的发展,子代通过不分家的方式在居住空间和家庭经济上依赖父代,父代作为不分家中的大家长,仍要承担家庭责任尤其是家庭在社区中的责任,比如走人情。但是不分家的父代作为名义上的当家人,实质是当空家,并没有能力统筹子代家庭资源,反而无限付出了自己的资源。因此,女性择偶虽然会通过婚姻要价提前分家财,却并没有提前明晰养老责任,甚至会以剥削老人的方式实现小家庭的城市化目标。

由此,一方面通过经济与空间的独立,家庭责任从大家庭式的统合分散到各个小家庭中。家庭关系的独立与家庭边界的划分,是子代家庭从父代家庭独立出来的结果。这一过程是从结婚分家开始的,女性在婚姻选择中的家庭倾向推动了子代小家庭的独立。子代家庭从大家庭的从属性依附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家庭结构的裂变,小家庭作为独立的家户单位,真正开始核心化。另一方面,在城市化压力下,子代

核心家庭从原本独立自主的核心化开始转向对父代资源进行剥削性的依赖,这种剥削性的依赖通过女性婚姻要价实现,预示着子代核心小家庭的进一步私人化,彻底丧失对大家庭的责任感和公心,其理性策略完全围绕自我小家庭展开。核心小家庭的私人化带来的是代际关系的剥削性失衡<sup>[23]</sup>。至此,从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演变中可以发现家庭性质核心化与私人化的生成。

## (二)农村女性择偶演变中的家庭现代化转型

女性择偶的家庭考量并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弱化,而且其对家庭的要求不断发生转变,从对家庭的社区性评价期待到对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要求,表明女性择偶中的家庭考量已经从家庭的价值性转向家庭的功能性,这是在现代性压力中的策略性选择。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现代性力量的不断渗入,带给村庄社会 and 农民家庭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现代性的进入带来村庄内部的低度分化,经济上的分化打破原有均质社会的均衡,村庄内部的竞争结构被激活。关中地区发达的村庄社会具有很强的面子竞争,这种面子竞争围绕着建房和丧葬展开。近些年,建房竞争弱化,但是丧葬竞争扩大化。例如,Q村村医父亲去世时宴请戏班共花费二三十万元。以经济和排场为标的的面子竞争打破了村庄的内生规范,将村庄的价值评价体系从道德品质论转向了经济价值论,家庭经济地位成为社会地位的评判标准,这也促发女性择偶的功利化。

另一方面,现代性进入的同时带来了子代成婚与进城压力,农民家庭传统的家庭再生产模式遭遇冲击,家庭发展面临危机。传统时期,围绕土地展开的家庭生产方式是一种简单的家庭再生产模式,土地的自给自足基本满足简单再生产的需求,只要经营好土地,就可以进行家庭再生产的复制。但是现代性的进入打破了这种循环,家庭再生产面临扩大化的发展任务,最突出的就是婚姻成本的上涨,尤其是与婚姻捆绑的城市化需求。Q村的彩礼从2014年开始上涨,由原本的1万元涨至5万元,2017年则直接飙升至10万元,甚至要房要车。子代成婚作为家庭再生产的基本要求,是父代的人生任务,而这一人生任务无法再依托土地实现,必须最大化地调动和压榨劳动力。这就带来以父辈资源最大化支持子代家庭形式的家庭资源的重新聚合,旨在实现以婚姻助推的城市化。

现代性力量尤其是现代性压力的进入,冲击村庄内生伦理价值规范,带来家庭发展任务的扩大化。在完成家庭基层再生产的本体性目标导向下,现代性压力的增大倒逼家庭从伦理性向功能性家庭转变<sup>[24]</sup>,通过家庭内部资源的高度整合实现小家庭功能性的发展目标。这一过程中,家庭的权力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并带来代际关系的冲突和养老问题。可见,女性择偶中家庭因素的演变,不仅仅是婚姻选择本身的变化,更预示着家庭的现代化转型。

## 四、结论与讨论

在阶层内婚制的婚姻选择中,女性择偶尽管趋向个性化

表达,但家庭因素同样重要,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农村女性择偶对男方家庭的考量具有不同的侧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看重村庄对家庭的社会性评价,这是集体时期村庄社会的内生凝聚对家庭伦理秩序的规定及大家庭互助逻辑的结果;八九十年代,土地的分散经营赋予个体家庭的独立意识,同时弱化了父代权威,家庭内部在私己诉求下矛盾频发,女性在婚姻选择中倾向于与兄弟家庭分开的独家独院,这预示着核心小家庭的兴起;2010年以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嵌入与城市化的兴起,同时婚姻圈的打破在性别结构失衡的情况下形成女性要价市场,女性在择偶中更看重家庭经济条件,并通过婚姻要价实现小家庭的城市化。

总体而言,女性在婚姻选择中的家庭逻辑演变在三个层面凸显:一是从对家庭外部关系的重视转变为对家庭内部关系的重视,尤其是满足核心小家庭的独立诉求;二是从对家庭关系的重视转变为对家庭经济的重视,尤其是对代际资源支持的依赖;三是从对家庭伦理性的重视转变为对家庭功能性的重视,家庭关系和家庭资源全都被压缩进子代家庭发展的功能性目标中。这一逻辑演变实现了家庭在现代性压力下的纵深发展,也带来家庭代际关系的阵痛。

将女性择偶中的家庭考量放置在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中,可以发现家庭在社会转型中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甚至被迫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中,家庭承载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是家庭内部的整合力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在此弹性的家庭应对机制中,子代小家庭平稳地进入城市化进程,实现现代化的转型。

#### 注释:

①这里划分的择偶阶段是按照女性20岁结婚的法定年龄进行的理想类型划分,其所对应的时期也是理想的计算,同时参照Q村的实际经验,比如Q村劳动力的彻底市场化是在2010年以后,而1980年初出生的年轻女性则可能在此之前成婚,因而并非绝对标准。

②本文案例来自笔者的访谈记录。

#### 参考文献:

- [1]石人炳.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J].人口学刊,2006(1):32-36.
- [2]王跃生.婚事操办中的代际关系:家庭财产积累与转移——冀东农村的考察[J].中国农村观察,2010(3):60-72.
- [3]孙秀艳.青年择偶标准的历史演变和现实思考[J].社会,2002(4):42-44.
- [4]李银河.当代中国人的择偶标准[J].中国社会科学,1989(4):61-74.
- [5]徐安琪.择偶标准:五十年变迁及其原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0(6):18-30.
- [6]朱梦冰.婚姻匹配问题研究进展[J].经济社会学动态,2017(6):121-131.
- [7]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24.
- [8]李煜,陆新超.择偶配对的同质性与变迁:自致性与先赋性的匹配[J].青年研究,2008(6):27-33.
- [9]梁颖,张志红,等.近40年我国18—59岁初婚夫妇婚姻匹配变动的城乡差异性分析[J].人口学刊,2018(2):60-71.
- [10]钱铭怡,王易平,等.十五年来中国女性择偶标准的变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121-128.
- [11]柳建平,王璇旖.贫困地区女性婚姻的减贫效应[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06-118.
- [12]毕文芬,初奇鸿.夫妻地位匹配与女性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变迁[J].宁夏社会科学,2017(6):126-136.
- [13]李煜.婚姻匹配的变迁:社会开放性的视角[J].社会学研究,2011(4):122-136.
- [14]马磊.同类婚还是异质婚:当前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5(3):29-36.
- [15]张冀.中国阶层内婚制的延续[J].中国人口科学,2003(4):39-47.
- [16]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J].江海学刊,2008(4):108-113.
- [17]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J].开放时代,2012(10):108-129.
- [18]刘燕舞.家庭结构转型下的农村妇女自杀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41-53.
- [19]桂华,余练.婚姻市场要价:理解农村婚姻交换现象的一个框架[J].青年研究,2010(3):24-36.
- [20]贺雪峰.关中村治模式的关键词[J].人文杂志,2005(1):139-146.
- [21]杨华.代际责任、通婚圈与农村“天价彩礼”:对农村彩礼机制的理解[J].北京社会科学,2019(3):91-100.
- [2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15-216.
- [23]陈锋.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49-58.
- [24]李永萍.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44-60.

(责任编辑 白洁)